



韩国研究丛书(56)

第十五届 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语言文学卷

제15차 중국 한국학 국제학술대회 논문집·언어문학편

主编 金健人

民族出版社



韩国研究丛书 (56)

第十五届 中国韩国学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语言文学卷

제 15 차 중국 한국학 국제학술대회 논문집 · 언어문학편

主编 金健人

民族出版社

책임편집: 전춘매

책임교정: 김해영

표지설계: 동방건곤

출판발행: 민족출판사

주 소: 북경시 화평리북가 14호 우편번호: 100013

홈 페 지: <http://www.mzpub.com>

인 쇄: 북경채운통인쇄유한회사

판 매: 각지 신화서점

출판회수: 2016년 9월 제1판 2016년 9월 북경 제1차 인쇄

절 지: 880mm×1230mm 1/32 자수: 480천자

전 지: 16.5

값: 38.00원

ISBN 978-7-105-14549-2/K · 2548(조137)

잘못된 책은 바꾸어드립니다.

편집실전화: 58130534; 발행부전화: 64211734



目 录 차 례

- 朝鮮朝의 思想文化와 小說文學 / 金健人 1
- 朝鮮文人李世龜次杜詩研究 / 左江 47
- 中韓古典詩歌中的竹意象研究 / 張國強 張俊霞 73
- 韓國에서 다른 植物로 認識되는 中國文學 속의
植物名 / 팽철호 87
- 中國과 韓國의 園林과 庭園 文化 / 송화섭 111
- 이태준의 「까마귀」에서 본 포우
시의 화소 / 김명숙 139
- 金台俊과 郭沫若 / 이용범 161
- 투르게네프, 고리키, 그리고 조명희 / 손성준 199
- 재일조선인문학의 민족성 변용 및
그 행방 / 김재국 244
- 염상섭 『三代』와 파금 『家』의
비교 연구 / 최미란 267
- 中韓左翼文學의 相互觀照 / 吳敏 廉慧慧 286
- 고려속요 속의 이국적 요소연구 / 김정위 306
- 동양사상에서 모성성의 인식
양상 연구 / 하서경 352
- ‘리본커팅 세레모니’와 땃줄자르
기의 隱喻 / 이윤선 377

한국어 화술 능력 향상을 위한 교수

연구 / 문영자 387

한국어 조리 동사 낱말발 / 황림화 404

백석 작품에 나타난 국민성 / 전월매 419

中国“南音”和韩国“歌曲”的比较研究 / 赵海洲 435

韩礼德系统功能理论视野下的韩国语

主位结构研究 / 郑杰 李宁 447

基于功能目的论的西湖景区公示语

汉译韩研究 / 娄小琴 468

‘~로 더브리’에 대한 재고 / 양언 479

论欧阳修词与早期高丽词关系 / 陶然 498

壬辰倭乱明水将季金的遗址和朝鲜文士的

酬唱诗文 / 朴现圭 507

朝鲜朝的思想文化与小说文学

金健人(浙江大学)

一、朝鲜朝的思想文化

1392年(李朝太祖元年),李朝建立。直至1910年被日本灭亡,朝鲜王朝历时近500年。与通过长期战乱改朝换代不同,朝鲜王朝开国君主李成桂,作为高丽朝的武将,拥兵夺权,社会过渡基本平稳。朝鲜朝的经济和文化,也就承袭了前朝高丽的发展成果。高丽王朝多处学习借鉴中国王朝的统治方略,已使朝鲜半岛进入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设立议政府,辅佐国王掌管各种政法事务,下辖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等六曹,分别处理国家不同重要事务。此外尚有司谏院、弘文馆、司宪府。将全国划为忠清、全罗、庆尚、黄海、江原、平安、咸镜、京畿等8个道,道下辖州、府、郡、县。对高丽末期的土地制度进行全面改革,颁布科田法,为恢复生产力,加强国力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采取减租减税、奖励垦荒、普及良种等一系列措施,使农业得到很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市场繁荣,纺织、造纸、采矿、冶炼、制陶、造船诸业也兴旺发达起来。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朝鲜朝的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得到很大发展。朝鲜国内商业出现汉城的京商、开城的松商、平壤的柳商、义州的湾商等富商大贾。随着商品的流

通,各地出现集市。李朝的对外贸易也发展起来,主要与中国和日本以官贸方式进行。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制度的巩固与发展,为李朝前期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早在高丽王朝建立初期,统治阶层就懂得儒学作为统治术的重要性。像高丽开国君主王建,虽然将佛教奉为国教,但实际上是佛儒兼学,佛儒并立。统治集团始终是儒、佛、道三教兼用并重的,而一般学者也是兼通三教的。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即是。

儒教与佛教,在(高丽)前期和中期,别无冲突之事,却为表里,以资于一代文运。苟以当时一般人的观念言之,儒与佛,俱为切实乎人间之教学。而儒则置重于人间之外的生活(即实际生活),以之整齐国家;佛则主眼于人间之内的生活(即精神生活),以之慰安之心。换言之,前者是齐家理国之学,即政治经济之学;而后者是修身治己、安心立命之教,即有关于来世生活之教理……当时儒佛两教,实因此而并立,而又互为表里,其关系较为密切。¹⁾

按照李丙焄氏的说法,儒教是治国的“表”,而佛教是修身的“里”,表里相依。这种互为表里的儒佛关系,最明晰地反映在高丽建国君王太祖王建的《十训要》之中。《十训要》是太祖为使后代君王避免耽于安逸与情欲,严守纲纪,早晚必须思想的十条训诫。943年4月,太祖在死前一个月,以遗言的口气转达了有关国体、国事、大经、大法等十项训要,要求后世君王遵行。其中,(一)、(二)、(五)、(六)、(八)等五项训要是有关阴阳浮屠即佛教、道教的内容,而(三)、(四)、(七)、(九)等

1) 李丙焄:《韩国儒学史略》,75页,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6。

四项训要与儒学有直接的关系。《十训要》的内容是儒、释、道的融合，即互为表里。关于这种三教和合，太祖自己也作过说明。当时参谋崔凝对太祖建国之初大兴佛道的行为进行劝谏。太祖并非不赞同他的意见，但指出：“然我国山水灵奇介在荒僻，土性好佛神欲资福利。方今兵革未息，安危未决，旦夕牺牲惶不知所措，唯思佛神阴助山水灵应，倘有效于姑息耳。岂以此为理国得民之大经也？待定乱居安，正可以移风俗，美教化也。”¹⁾

958年，高丽光宗(949—975在位)设科举制，部分保留了旧有的世袭荫叙制度，科举成为高丽王朝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成宗即位时，崔承老上书治理国家之策，即《时务二十八条》。崔承老为六朝重臣(927—989)，十二岁即得太祖赏识，历太祖、惠宗、定宗、光宗、景宗、成宗六朝。他上疏指出高丽朝从太祖创立高丽至成宗时，已历六十余年，如今佛教盛行，寺院林立，导致耕地减少，经济衰败，建议成宗少做佛事，光大儒学。他在第20条中说：“且三教各有所业，而行之者，不可混而一之也。行释教者，修身之本；行儒教者，理国之源。修身是来生之资，理国乃今日之务。今日至近，来生至远，舍近求远，不亦谬乎？”崔承老从国家的长治久安考虑，认为与佛教的传授相比，儒学宜急务先。“高丽的儒学，一直比较重视经义，理学家们也重视朱子著作的演绎，这与儒家思想是从国外输入的有关。而高丽的社会状况却与中国的宋元不同，社会等级更为严格，因此儒家思想存在的形式和发挥作用的方式就有所变异。高丽输入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正统一支，维护纲常礼教、等级秩序的作用非常突出。可以说，儒家

1) 崔滋：《补闲集》，见《高丽名贤集》第2册，106页，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影印。

思想在高丽被改造成了适合于高丽社会的思想武器，在维护高丽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¹⁾到了高丽末期，排佛扬儒的主张愈发引起学界的共鸣。1390年，高丽恭让王欲迎曹溪僧粲英为师，大司宪成石璘、左常侍尹绍宗等上书谏诤，历数佛教败国之史鉴。成均馆金貂等人上书言辞激烈，激怒恭愍王，险惹杀身之祸。在郑梦周等上书劝说之下，金貂等人才幸免于难。1392年，高丽末期的武臣李成桂得以从其手中夺取王位，主要是顺应了新兴士大夫阶层的要求。

李氏朝鲜王朝建立后，急需一种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加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权近的《入学·图说》以图释朱子学之要义，他认为：“就人心性上，以明理气善恶之殊，以示学者。……人兽草木千形万状，各正性命者，皆自一太极中流出。故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源，一草一木各一太极，而天下无性外之物，故中庸言，能尽其性，则能尽人性，能尽物之性，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呜呼，至哉！”他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运用于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观，为李朝的封建秩序创建理论根据，将李朝的建立说成是李成桂受天命而创建，并强调国王应遵循理学，施行儒家的王道政治。儒学适应了这种需求，便理所当然地取代了佛教，成为朝鲜王朝的国学。朝鲜王朝设立了成均馆儒教大学，选拔官僚的科举制度也更趋完善。李朝初期编纂的六卷《经国大典》，体现了以儒学为理论基础的治国法则，成为应用于整个朝鲜时代的主要法典依据。太宗时期，平壤府印制《家礼》150部颁赐各司。科举考试中增加了《家礼》的测试。世宗大王时期，制定了《三纲行实图》和《国朝五礼仪》，从儒学的基本政治理念出发，对家礼、国礼的研

1) 李岩，徐健顺著：《朝鲜文学通史》(上)，260~2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究成为朝鲜朝治国持家的主要思想理论。儒学与政治紧密结合，出现了政教合一的儒学政治化现象。

二、朱子学的一枝独秀

朝鲜王朝的儒学，与中国儒学的一个最大不同是，朱子学一枝独秀。第一次将朱子学著作带到朝鲜半岛的，是高丽忠烈王(1274—1308在位)时期于元朝学成归国的安珣(晦轩，1243—1306)。继安珣之后，白颐正、李齐贤、朴忠佐等人，都热心程朱理学。同时，高丽朝还曾派人到中国江南购入书籍一万八百余卷，元朝也曾将宋的秘阁藏书4371册赐给高丽。这些书籍中，性理学，即朱子学的书籍居多。因此，一般认为中国宋朝性理学于13世纪初叶传到了朝鲜半岛。到朝鲜朝，朱子学更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推崇。创立韩国朱子学的首推郑道传(1342—1398年)，他既是高丽末期的高官，又是李朝的开国元勋。他从朱子“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的观点出发，认为太极是先行于客观事物而存在的精神实体，阴阳是从太极中派生出的第二性的东西。他说：“盖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太极，而天地万物之理，已浑然具于其中。故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如水之有源，万派流注，如本之有根，枝叶畅茂”，在韩国最早建立儒教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权近为韩国儒学图说之鼻祖，他的《入学·图说》是韩国最早的儒学图说书，其影响巨大而深远。其后出现的金泮的《续入学图说》，权采的《作圣图》《作圣图说》，郑之云的《天命图说》，李滉的《圣学十图》等图说儒学的书籍，皆受权近的书籍《入学·图说》的影响。权近在《入学·图说》中，首

次提到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与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之关系。他认为四端由“理”和“性”所发,纯善无恶;七情由“气”和“心”而成,有善有恶。这是在韩国儒学史上最早提出四端、七情与“理”和“气”关系的。从而导致其后出现韩国儒学史上绵亘数百年的“四七论辩”。把韩国儒学推上最高峰的,当数李滉(号退溪,1501—1570)和李珥(号栗谷,1536—1584),人称海东儒学之双峰。

李滉隐居不仕,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强调“理”是根源性的存在,具有能动性和优先性,对性理学的各个领域开展广泛探讨,编纂了《朱子书节要》,撰写了《启蒙传疑》等著作。68岁那年,他把自己的代表作《圣学十图》献给年幼的国王,这是他晚年以其成熟的学术眼光对整个性理学所做的精要整理和概括。李珥才华出众,科举考试中多次拔得头筹,走上仕途后,曾任吏曹、兵曹判书,担任大司谏、大司宪以及弘文馆、艺文馆大提学等职务,是位于政治核心的士林代表。与李滉认为“理”与“气”不可混同,李珥认为“理”“气”不可分离。李滉认为人心与七情相通,道心与四端相通,把人心与道心进行明确区分,强调的是“敬”;李珥则指出,四端为七情中之善者,把四端包含在了七情之中,认为人心与道心并不对立,人心得其正即为道心,强调的是“诚”。李珥还注意到现实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应“随时变通,依法济民”,也就是说,他并不认为存在着亘古不变的原理,非常重视程子所说的“因时而变即常道”,主张以“气”动为基础的性理学说的经世论原理。所以,他的经世思想追求原理与现实的统一,提醒人们学术不能流于空谈,应追求在实际事务中的真实性和效用性。这可以说开启了朝鲜后期的实学思想潮流。

李滉、李珥将李朝朱子学发展到顶峰,李朝后期,实学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丁若镛成为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官学、私学均得到很大发展。西学的引入和天主教的传入对李朝的思想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训民正音的创制，使朝鲜民族终于有了自己本民族文字，为韩国文化史的划时代事件，至此，韩国才出现了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本，也才有了真正自己的国文文学。

三、韩国小说史的开端

金时习(1435—1493年)创作的《金鳌新话》，标志着韩国小说史的开端。从外部来说，15世纪前后，中国明朝的传奇小说开始传入朝鲜，其中瞿佑的《剪灯新话》对金时习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从内部来说，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消费群体，他们要求能够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更加具体、细致地反映朝鲜社会生活的叙事文学样式的出现，加上高丽中期以来民间传说、故事等创作素材的积累，共同促成了朝鲜朝小说的产生。

金时习出身于汉阳一个封建贵族家庭。他5岁能诗，有“神童”之称，并受到过国王世宗的喜爱和赏赐。李珣的《金时习传》记录了金时习幼时的这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他满怀着对世宗大王的感激之情，发奋苦读，来日图报。然而当他21岁时苦读于三角山中等待封官时，发生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世祖篡夺了侄儿端宗的王位。得知此事，他极为愤慨，为抗议世祖的倒行逆施，他放弃了做官的打算，撕毁儒服，焚弃儒经，削发为僧，四处云游。他30岁时定居庆州金鳌山六年，所以他的小说集也以“金鳌”名之。37岁时，成宗即位，他虽应国王之召去

到京城，但仍无意仕途，后又返回金鳌山。1481年还俗，晚年在江原道雪岳山隐居。

《金鳌新话》现存5篇短篇小说。《万福寺樗蒲记》描写青年男子与女鬼相恋的故事；《李生窥墙传》描写李生与崔姓少女秘密相恋的故事；《醉游浮碧楼记》描写富家子弟洪生与天仙相恋的故事；《龙宫赴宴录》描写松都文人韩生，因擅长诗文，名噪一时，其盛名甚至传至朝廷。某日深夜，忽有穿青衫头上戴幞头的郎官二人，奉龙王之命前来邀请他去龙宫赴宴。韩生应邀入龙宫，为龙女新房写《上梁文》。龙王设宴款待。韩生返回原地后，不再以名利为念，入名山，不知所终。《南炎浮州志》描写儒生朴某梦中与阎罗王交谈，阎罗王钦佩其学识，欲让位给他。朴某醒后得病，不治而死，死后继任阎罗王。朴生不相信佛家宣扬的所谓“天堂地狱之说”“三世轮回之说”等，即便在阎王面前也直言不讳。作品还借阎王之口来否定佛家之说，如阎王说孔子“以正去邪其言正直”，而释迦“设邪去邪其言荒诞”等，这种借阎王之口来否定佛家之说的叙事策略，较之以他人或自己否定佛家之说，其效果更佳。《南炎浮州志》主人公朴生对儒家持全盘肯定的态度，而对佛家则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虽然并不等于就是金时习的宗教观以及他对儒佛的不同态度，然而，从中还是可以透露很多这方面的信息。金时习在世祖篡夺其幼侄端宗王位的朝鲜朝初期社会语境中，假托梦中的奇异游历并借阎王之口，影射和鞭挞了世祖篡位之丑行及当时朝政之混乱，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就是建立在儒家王道主义与民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国家观。在作者笔下，阎王仔细倾听了朴生所讲的三韩兴亡史后，就说君主不能以暴力统治臣民，社稷也非君主的囊中之物。“《南炎浮州志》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政治理念实际上就是金时习的思想写照。但他没有让朴

生直抒胸臆，而是假托阎王来陈述，这或许是作者为求自保而有意采取的叙事策略。总之，《南炎浮州志》是借以了解金时习宗教观与政治理念的最重要的一篇作品。”¹⁾金时习虽曾出家为僧，但骨子里却有着正统的儒家思想，后来的哲学大家李珣以“心儒迹佛”概括了他的一生。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是尊君爱民的中央集权制思想，强调的是正庶分明的正统儒家观念。作品以倭寇之乱、红巾贼的入侵、世祖的篡权等朝鲜社会特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选择神怪和艳情两方面的题材，在人物塑造上，以才华横溢的书生为主角，身处现世，怀才不遇，只有在鬼神世界才能找到挚友知音。作品不仅表达了作者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思想感情，同时也让人依稀可见作者的身世行状。

四、儒家文化的影响

赵润济在他的《韩国文学史》中曾作过这样的概括：“如果说金时习是我国小说文学界的先驱，许筠是其后继者，那么金万重则是继许筠之后的又一后继者，是他把朝鲜小说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²⁾金万重留给后人的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九云梦》，一部是《谢氏南征记》。小说以明朝时期的中国为舞台背景，描写了一个官宦家庭内部因妻妾之争引起的纠纷和由此导致的正盛邪衰的结局，讲述了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正妻与后妾之间矛盾争斗的故事。德才兼备的谢氏嫁到刘家九年无

1) 金宽雄，金晶银：《韩国古代汉文小说史略》，1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 [韩]赵润济：《韩国文学史》，25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孕，劝丈夫刘翰林(刘延寿)纳进后妾乔氏，结果生性嫉恶的乔氏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害谢氏，谋得正室地位，致使谢氏浪迹千里，几处死地，直至乔氏劣迹败露，遭受惩处，谢氏与刘翰林夫妻团圆，白头偕老。

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儒家思想中家族血缘是人际关系的中心，所以，儒学中历来就保持着忠孝一体化的伦理体系。忠是对君主或国家的服从和奉献；孝是维系家族内部人际关系秩序的道德伦理。“国家”和“家国”也便具有了同样的意义。金万重(1637—1692年)的《谢氏南征记》，可以说成为诠释儒学家庭人伦关系的教科书。金万重大力倡导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谢氏南征记》便是他的国语长篇小说。后来，是他的堂孙金春泽将这两篇小说译为汉文。

《谢氏南征记》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小说，是作者在南海孤岛过流配生活时写成的。在儒家的理想结构中，“齐家”与“治国”互为因果。所以，理顺家庭关系被提高到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对那些封建士大夫来说，“修身”“齐家”“治国”是其意识、行为的准则和座右铭。作者创作《谢氏南征记》的目的，是想通过小说唤回肃宗的圣心，惩治邪恶与奸佞，以维护封建王朝和封建贵族家庭的正统秩序。作为封建士大夫文人，金万重一生都在追求儒家的理想社会。小说最后所描绘出的妻妾和平共处的和谐的封建家庭模式，同时也是作者所向往的理想封建社会的象征。可以说，《谢氏南征记》的创作，是作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作的最后努力。

《谢氏南征记》线索头绪少，主要以谢氏与乔氏之间矛盾纠葛为主，引人入胜的是双方及其协同力量相互之间的争斗而激起的波澜起伏。正是在这个正室遭受后妾加害，颠沛流离，几欲自杀，最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故事里，作者深谙“文似

看山喜不平”的叙事要求，在后妾乔氏加害正室谢氏的过程中，布设了三大波折：一害，乔氏与李十娘等合谋，反诬谢氏压沮乔氏及乔氏幼子；二害，乔氏与奸仆董青合谋，偷出家传玉环伪造谢氏偷情证物；三害，董青与腊梅合谋，压杀乔氏之子掌珠诬陷谢氏。至此，已被乔氏等人施以障蔽术的刘翰林忍无可忍，把谢氏罚出祠堂逐出家门，扶乔氏为正室。谢氏被逐出家门后，作者再布设三逼三波折，一而再、再而三，让乔氏直欲置谢氏于死地。一逼，谢氏寄宿刘家祖墓旁，乔氏与董青合谋，遣恶人劫持谢氏欲败其名节，谢氏惊梦逃脱；二逼，谢氏赴长沙投奔杜夫人，及到长沙才知杜夫人已随子迁去成都，陷入举目无亲的境地；三逼，谢氏所陷走投无路之地，正是屈原含冤沉江之处，此巧合令谢氏认为死于此乃天意使然，决心投江自绝。作者偏有把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本领，让娥皇、女英托梦谢氏，遣妙喜尼僧救谢氏出绝境。以上三害和三逼，基本上为串珠连接式，一事件为因导出一事件之果，前一事件之果又作后一事件之因，因果相连，环环相扣，步步紧逼，极尽摇曳。

全书中心人物谢贞玉，成为儒家思想最完美的体现者，作者通过她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样样具备；择夫标准贵德而贱色，对丈夫刘延寿极为忠顺；当刘延寿惑于乔彩鸾谗言，将她无理废黜，使之蒙受奇冤大辱之时，她丝毫不作辩解，反以“罪人”自处；被丈夫无理废黜、逐出家门之后，拒绝了弟弟请她回娘家的建议，甘愿到刘家祖坟所在地租间茅屋艰难度日；当她在历尽千辛万苦、九死一生之后，与丈夫久别重逢时，竟无一句怨语，反倒自责感悔；为了使夫家不绝后嗣，曾再三力劝丈夫娶妾，希望夫家不至断后……向读者展现出一个百分之百合乎儒家之妇道懿范的理想人物。

《谢氏南征记》以“劝善惩恶”的家庭问题小说而称著于世。

实际上，正如一些资料所揭示的，它是一部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侧面反映王室内部问题的作品。朝鲜王朝肃宗(1674—1720在位)受美貌的张禧嫔之惑，初而疏远忠厚善良的仁显王后，继而将之废黜，立张禧嫔为正。金万重以其对王室的忠忱进谏，却被罢官流配。他于谪所岭海以妾惑丈夫陷害正妻为题材写成《谢氏南征记》。据说肃宗后见此书，深为后悔，废张而复立原王后。由此可见，这部通俗小说对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起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不仅在作者的创作动机和作品效果上如此，而且作品本身从头至尾的故事情节、思想内容，也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与因素。主人公刘延寿的家庭风波，他的荣辱祸福，都与朝廷、官场上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作者通过人物的刻画，情节的进展，表现了他鲜明的是非观念与褒贬态度，而其是非褒贬所依据的准绳，正是传统的儒家思想。¹⁾

如果说《九云梦》的佳妙在于极写八位美女而又尽显其不同之美，那么，《谢氏南征记》独擅的胜场则是极写数个恶人而又劣迹不同。谢氏是作品的主角，她的对象当然是乔氏；并且，这对矛盾关系又可以反过来看，即在事件的发展中，乔氏又往往是主动采取行动的支使者，而谢氏则成为逆来顺受的承受者。杜夫人、妙喜，包括娥皇、女英和观世音菩萨等等，都在角色模式中充当助手功能，协助谢氏逃离困境；而董青、李十娘、腊梅、雪梅、冷振等人，都在角色模式中充任对头功能，为虎作伥，伙同乔氏作践谢氏。作品中谢氏的丈夫刘翰林角色分工较为复杂，为了使刘翰林这样天资聪颖的人物终至落到如此昏愤的地步，作者也特地安排李十娘使巫术障蔽刘翰林的神

1) 韦旭升：《韦旭升文集》，第四卷，10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